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构设普遍诗学

——周珏良比较文学论集

► 周珏良 著
► 张洪波 汇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构设普遍诗学

——周珏良比较文学论集

► 周珏良 著
► 张洪波 汇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设普遍诗学: 周珏良比较文学论集 / 周珏良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6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00-4992-2

I. 构… II. 周… III. 比较文学—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5866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满兴远

封面设计: 彭 山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37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4992-2

定 价: 23.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前言

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一文中曾对单一学科的教育提出过批评。蔡先生说：“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它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蔡先生提倡的是通才教育。蔡先生的这个提法对中国的外语类院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人文教育的相对薄弱，中国文化的素养相对不足，使得外语类院校的毕业生的文化和学术视野相对狭窄，并已经严重阻碍外语类院校的学科发展，其严重性已经引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今天的外语教学已经与当年吴宓先生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所倡导的“会通中西，学识博雅”的外语教育思路相距越来越远了。

那么，如何在外语类院校加强人文学科的教育呢？把比较文学课程列入外语类院校的基础课程应该是办法之一。杨周翰先生当年曾经说过：“我们出版的外国文学史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很不够，有时又很勉强，最不够的是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今文学的联系……我觉得教外国文学有意识地同中国文学作些比较，辨其异同，可以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本国文学的理解。”杨先生的话点出了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缺憾。外国文学是外语类院校的主干课程。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往往忽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只是单纯地分析和讲解外国的文学作品，很少自觉地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加以比较，无论是历史地比较还是平行地比较。其实细想起来，如果完全抛

开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的讲授和研究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讲授外国文学,我们面对的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够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出发来讲授和研究外国文学,我们的学生就不会跟在国外研究人员的后面,人云亦云,而会逐渐学会用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来欣赏和分析外国的文学作品。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学术传统的大学。当年吴宓先生的两位高足王佐良和周珏良教授不仅是北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创立时期的奠基人。王佐良先生是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的前三届的中方代表团团长,他的《论契合》一书曾获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最高荣誉奖。他们为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学术遗产。另外,北外讲授着34种外国语言,这也为我们展开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创造了语言上和学术上的条件。去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我们将继承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发挥北外的优势,把比较文学作为我们的重要学科来建设。

为发扬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我们于2004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部分外语类院校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讨论会,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在外语类院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同时也应发挥外语类院校的学术力量,推动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这套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第一辑收录了五本,分别为《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构设普遍诗学——周珏良比较文学论集》、《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下)、《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希望该丛书的推出能够对我国的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所助益,有所启示,也衷心希望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开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

编者序

——周珏良：“普遍诗学”的构设者

在共同为中国比较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复兴和崛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第一批先行者中，王佐良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同行和挚友周珏良先生：“建立普遍诗学，珏良是最有资格的一人。”既为《周珏良比较文学论集》的编者，笔者捧读珏良先生的丰富著述之时，势必应从“普遍诗学”的角度来切入和思考：珏良先生构设“普遍诗学”的出发点是什么？如何探寻其建立“普遍诗学”的思想轨迹？是否可以尝试勾勒出其所筹划的“普遍诗学”的基本架构？

周先生著述中有关“普遍诗学”的直接理论阐述并不多，但是在深入文本的反复研读和仔细揣摩中，笔者发现，珏良先生的毕生研究和著译，的确是以“普遍诗学”的综合筹划为前提、远景与“整体效果”的（借用珏良先生用语）。

一、中西合璧的学养背景： 家学传统与西学师承的结合

王佐良先生有关建立普遍诗学的“资格”之说，是就学养背景与知识结构方面的极高水准而言的。

珏良先生是清末著名的书香继世的“安徽东至周家”之后人：曾祖周馥，清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清进士，精医学，著有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也是著名的善本书和文物收藏家。珏良先生少年时代常在父亲的装满宋、元、明、清古籍善本的书斋里读书，很早就在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典籍中浸润涵

泳,“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严羽《沧浪诗话》),逐渐积累了深厚的国学素养,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文献学、版本学方面的知识。

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珏良先生把在家庭中受到的中国古文献学的陶冶,同大学教育中的西方现代目录学结合起来,牢固树立起以版本目录学为“入门之学”的研究观念。他曾指出:“不管研究哪一门学问,要不先掌握这门学问的版本目录学(bibliography),那就等于旅行不看地图,航海不看海图,就会弄不清方位,找不着方向。一本有关某类学问的入门书,如果在这方面不能给读者以指导,那就可以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我们研究一门学问,如果对于有关的版本目录学不去注意,甚至不发生兴趣,那也可以说还没有入门。”(《一本好的入门书——评〈诺顿美国文学选〉》)

珏良先生对于版本目录学之重视及其功力之深厚,在他的英文论文“On and Around the Dream —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Hongloumeng* (1976—1982)”(《近年来红楼梦研究概述》)中可见一斑:他用中国文献学结合英美新目录学的方法来整理1976—1982年间国内“红学”领域的复杂情况,把当时研究《红楼梦》的书目、作者和续作者传记、作者真伪问题、脂评和其他评点、影印古本、新出版本、译本、评论性书籍和文章,以及关于曹雪芹的佚著和遗物发现等方面作了一个学术综述,其中脚注109条,涉及书籍文章120种。王佐良先生称赞它“全局在揽,条例分明,评论恰当而可观”,此文在国外学界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同时,从珏良先生的所有其他著译中,读者皆不难看出其背后翔实可靠的中英双语文献材料基础,可见珏良先生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精深学养,已为其从事跨越中西、难度极大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稳健、令人信服的知识根基。

学校教育方面,周先生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本科入清华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学习,所遇良师有吴宓、温德(Robert Winter)、钱钟书及燕卜苏(William Empson)诸先生;四十年代后期

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克莱恩（R. S. Crane）教授及其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攻读英美文学及文学批评，于1948年毕业。系统的大学专业教育与诸位名师的指点，使珏良先生广泛阅读英美和西欧文学之余，又学到了英美“新批评”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英美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

从整个学养背景看来，根基深厚的家学传统、系统专业的西学师承，再加上天资聪颖勤奋，使得珏良先生成为了一个“既能欣赏又能分析，既有文学的史的学问又有理论的学者”——“中国一般学外国文学的人没有他的中文功底，而中国一般谈比较文学的人缺乏他的外文修养”（王佐良语）——中西合璧的知识储备，已使珏良先生率先成为从事跨越中西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适当人选。

二、中英文论的互补：“形式直觉” 与“形式分析”的融通

家学与师承的中西合璧，使得珏良先生在面对中英两种文化、文论传统之时，具备两大优势：其一是由于熟悉西方传统学派、新批评派、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等的成就，他对于当代新文论的背景和渊源比一般人清楚，善于把它放在适当的历史地位，既不为其新奇所惑，又不会看不出其发展的意义所在；其二是他在中国古典文论方面的修养，使他能够以超越西方的另一种标准来判别事物，不至于受一时时尚的操纵（参见王佐良《怀珏良》文）。

正是从这种“中英互补”的知识背景与思维趋向出发，珏良先生逐步形成了有关“普遍诗学”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文学理论层面的表现，见于中国诗论“形式直觉”精神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分析”思想的内在融通。

在《中国诗论中的形式直觉》一文中，珏良先生汇聚了众多古今中外艺术创作者的经验之谈作为例证（颇似他老师钱钟书先生论述风

格), 来说明“形式直觉”乃“一切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根本”, 而中国传统诗论、文论的主要精神, 是主张通过“多作、多看、多读”来“体会”和“感受”的艺术实践方式, 培养一种“直觉”地掌握“艺术形式”的能力——他认为这种“直觉”评论方法, 其实可以应用到英美文学研究中去; 同时, 在《对新批评派的再思考》一文中, 珏良先生指出以其老师克莱恩教授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秉持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有一个核心主张: 分析文学作品首先要找出它的“形式”作为指导原则, 来研究其各“组成部分”如何形成一个“艺术整体”来服务于它的这个特殊形式——他认为这同样是一条可以“广泛适用”的文学分析原则。

综观珏良先生以上两篇重要论文中的核心论点, 不难看出“形式”一词(他阐释为非形式/内容二分的“形式”, 而是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里所讲“形式因”的形式)在中国诗论及英美新批评派观点中便具有了通约性; 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那里, 对于作为“指导原则”出现的某种艺术“形式”的“整体”把握, 其实已趋近于“形式直觉”范畴; 而对这一“整体形式”的各“组成部分”的分析, 则属于在中国诗论“形式直觉”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的“形式分析”的工作。至此, 分属中西两个文论传统的“形式直觉”和“形式分析”, 在珏良先生分跨中西的“推广应用”中, 已经互补、融通到了一处——中国传统文论的“形式直觉”, 可补英美新批评派“形式分析”的“难见大体”之弊; 而新批评派的“形式分析”, 又可反补中国文论“形式直觉”的“蒙眬模糊”之弊, 二论的相反相成, 相得益彰, 便构成珏良先生所倡导的“普遍诗学”的内在理路。

三、中英文类的互识: “整体效果”与 “部分细读”的整合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具体操作方法上, 透彻了解英美新批评派利弊的珏良先生并未盲目照搬其方法, 而是针对其处理文学语言的

片面倾向，反对“把语言（如一字、一句）看作是独立、孤立的，不顾其在整体里是否讲得通而无限地推论及联想”的偏弊，进而采用了芝加哥学派更为全面的修正办法：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出发，依其各“部分”的重要性——按亚里士多德在希腊悲剧研究中所定的主次，依次为情节、人物、思想、语言——进行分析，最后再用整体的特点来研究语言的特点。

珏良先生这种将“整体效果”与“部分细读”精心整合的文学分析方法论，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前我国的文艺评论，无论是对古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的艺术性或艺术形式的分析，比较一般化，深入不了，或者有意无意依照一些从建国时相沿下来的模式。如讲《红楼梦》，就是‘主线’问题或人物性格问题，而以全书作为有机整体，把情节、人物、人物思想、语言作一综合研究的书或文章，至今尚未见到。而如果想做这桩工作，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实践会很有帮助。”（《对新批评派的再思考》）

珏良先生在小说、戏剧文类的作品分析中别开生面的方法论示范，首推《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哈克贝里·芬〉的比较研究》一文：本属情节迥异，而且文化与时代背景也完全不同的三部小说，珏良先生却能在“部分细读”之后，看出三者“整体效果”方面存在着一个惊人的共同之处，即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选择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大观园、密西西比河、鲸鱼出没的海洋——来追求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一旦外面那个异己的世界侵入，就发生冲突，造成戏剧性的大场面。换言之，园、河、海不止起了描写人物性格和创造气氛、烘托行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书的“结构原则”。论文最后，珏良先生满怀希望地提出“普遍诗学”的构想：“既然在三部写于不同时期而民族和文化背景又各不一的书里可以寻到一个共同的结构原则，我们可以有理由希望通过不同背景的书和归纳性研究，找到更多的共同结构原则，甚至最后建立起某种有实用价值的普遍诗学来。”

对于普遍诗学理想的探寻,在珏良先生所偏爱的诗歌赏析之中,表现尤为深入和分明。在《穆旦的诗和译诗》中,他把穆旦《森林之魅》中写死亡化而为乐与济慈《夜莺颂》中写乐极而思死对照起来分析,发现“古今中外的诗情往往相通”;在《雪莱的命运和对我们的启发》中,他兴奋地发现“用中国传统的诗感来读雪莱倒也不难接受,因为它能容忍很大的朦胧、模糊”,进而提出:“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可以用中国的诗感来运用、比较,可以有新天地,许多境界中国人易接收、体会,比较研究大有搞头。”

在给中国读者深入、具体、生动地介绍和评析英美诗歌时,为了将全诗旨趣之“整体效果”与诗中语言、格律之“部分细读”有机整合起来,珏良先生不但采取了中国古典诗话的夹叙夹议的评点办法,而且还经常拿中国诗来作比较,使中西“诗感”在相互汇通、交相辉映之中焕发出异彩。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在赏析艾略特的诗《序曲》(T. S. Eliot: *Prelude*)之时,他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在分析全诗的“整体艺术效果”时,指出艾略特的写法和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很相似——虽然一个写的是自然小景,一个写的是城市小景,题材不同,且艾略特把描写对象从大自然的美景转向城市中不那么美、甚至是很丑的景色,但艾略特所用的题材、所选的意象,如 *burnt-out ends of smoky days, gusty winds, withered leaves, grimy scraps, broken blinds, chimney-pots, lonely cab-horse 的 steams 和 stamps*, 都表现出在风雨黄昏时候,现代城市里平淡单调的生活所引起的惆怅无奈的情境——这分属中西的两首诗,其实采用的是同一种“以景见情”的艺术手法;(二)在对《序曲》头两行“The winter evening settles down / With smell of steaks in passageways”进行“部分细读”时,珏良先生指出这两句诗出人意外地从视觉转到味觉,写起了黄昏降临时城市人家巷道中飘来的晚饭牛排味道——以这一意象描写城市中的黄昏,可谓入神,也十分新颖——他由此联想到我国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两句诗:“暧暧远人村,依

依墟里烟”——也是写黄昏，但地点是农村，“墟里烟”指炊烟，也是晚饭的象征，不过在农村人们住得分散，只能由遥遥“看见”的炊烟中，依稀地“闻到”那农家晚饭的“味道”——这同样也是由视觉牵着味觉的角度来描绘，与艾略特可谓异曲同工。珏良先生感叹：“这一今一古，一中一外的两位诗人时间相隔千年，地点距离万里，而文心竟如此相同，可谓是一趣事。”

四、 中英文学翻译思想：“传神”和“译述”

要寻求跨越中西的普遍诗学，文学翻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珏良先生是一个卓越的翻译家。他担任过朝鲜停战谈判的翻译，也曾任外交部翻译室的负责人之一。他也是《毛泽东选集》卷五、《毛泽东诗词》和《周恩来选集》英译的定稿人之一。然而，他主要的翻译工作仍集中于文学翻译方面。他认为，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个“理解”原著的问题，以及在另外一种语言里“表达”的问题。

首先，他主张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要精通外文，因为完全通过翻译作品来搞比较研究，有很大的限制也有一定的危险；

其次，他认为文学翻译应该和研究工作相结合，要对原文下“细读”的功夫，要全面了解，要理解得透彻；

第三，他认为翻译语言应使用一种“提炼了的白话”，要避免俗语化，并力求使它达到古文所有的简洁境界；

第四，就文学译作的“艺术性”而言，珏良先生最看重它是否“传神”、是否有“诗味”。比如，他推许霍克斯英译本《红楼梦》，指出它最大的好处在于“能传原书之神”（《读霍克斯英译本〈红楼梦〉》）；他评论查良铮译本《唐璜》最难得的好处，亦在于能传拜伦原作的抒情、讽刺之“神”（《读查译本〈唐璜〉》）；他认为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的成功之处，亦在于能够传达出原剧的“诗味”（《卞译莎士比亚悲剧与

素体诗的移植》);

第五,文学理论的翻译方面,他认为“文学批评家各自有其一套基本概念和他惯用的一套术语,同时也针对他心目中的读者对象而假设某些知识是读者已知的,不会事事都从头讲起,学术性越高的文章越如此。翻译出来,对象不同,读者的背景不同,当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太多注释又会阻碍阅读且减损兴趣,所以他主张采用一种“译述”的办法:“译者要先对原文了然于胸中,下笔时不要太拘泥于一字一句,主要在把意思表达出来,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夹译夹述……当然能这样做的前提是:对作者的理论体系要很熟悉,对所译文章要懂得透彻。”(《论翻译》)珏良先生翻译美国麦克兰(Norman Maclean)的“《李尔王》分析”一文,用的就是“译述”方法,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理解。

有心的读者,在欣赏珏良先生的精品译作之时,不可遗漏他在译序或译后记中对原文与作者之时代背景及版本目录学方面的史的介绍;不可错过他对原文整体艺术效果的点睛之评;更不可不仔细体会他在原文细读与译文表述之间反复斟酌比照、打磨“再造”的艺术匠心——这些倾注心血的努力,其意皆在于汇聚中西共同的“诗心”与“文心”。

五、结语:反思与展望

通观珏良先生为追求中西文学之“共同结构”而构设“普遍诗学”的整体思路和丰硕成果,其博学敏悟、勇于探索、锐于实践的先行者风范,令人景仰,启人深思。

不过,在跟随前辈足迹继续深入探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中西诗论相互趋近的“形式直觉”与“形式分析”观念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难以弥合的内在裂痕:珏良先生曾承认其“形式分析”方法中,暗含着有关文学作品“整体效果”的一个基本假设——“作品是个实在的有

机整体，并有统一的感情效果，作品本身与它发生的效果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毕利·伯德〉的一种读法》）那么，这种作品“整体效果”即“形式整体”所具有的“明确因果关系”及其“实在”、“统一”特点，与中国诗论“直觉”式的“形式整体”所具有的难以明确界说和分析的“朦胧”、“模糊”、“感性”及“不确定性”特点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又应如何充分面对并具体处理呢？中西文论之间的这种内在“裂缝”，其实已经表明，文学形式分析中这种寻求“明确因果联系”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可能导致对文学作品“艺术形式”之“整体美感”的相当程度的“缩减”。

在普遍诗学的探索路途中，在先驱者路径的指引之下，新问题、新启示的浮现，同时也就为新思路、新理论的生长和发展，敞开了新的空间。就在这薪火相传的求索与推进之中，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正徐徐展现。

最后，尚需说明的是，本着尊重作者、尊重原作发表或出版时的原貌的目的，对书中个别字词、译名及注释条文，虽有别于常规，亦一仍其旧，只有少数几处，以编者注的形式略加说明。

张洪波

2005年3月3日

目 录

编者序	v
-----------	---

中国和英美文化、文论间的互补

数百年来中英文化交流	2
中国诗论中的形式直觉	42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学批评	53
对新批评派的再思考	70
一本好的入门书——评《诺顿美国文学选》	85

中国和英美小说、戏剧、诗歌的互识

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哈克贝里·芬》 的比较研究	94
On and Around the Dream —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i>Honglouloumeng</i> (1976 — 1982)	105
《水手毕利·伯德》的一种读法	128
《麦克白》的悲剧效果	143
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诗	158
英诗赏析	179
穆旦的诗和译诗	211
雪莱的命运和对我们的启发	221

文学翻译：理论与评介

论翻译	228
读霍克斯英译本《红楼梦》	246
卞译莎士比亚悲剧与素诗体的移植	257
读查译本《唐璜》	267

精品译作

《李尔王》分析	276
济慈论诗书信选	304
1855年版《草叶集》序言	327
英诗十首	347
熊	361

中国文学与英美文学百年论

中国和英美 文化、文论间的互补